

邵景均◎著

怎样做好官



在做官起点和灵魂上，坚持一心为公，大公无私；在与人民群众关系上，坚持以仁爱之心，解民之忧，求民之乐；在工作上，坚持明道善策，做到决策英明、用人贤明、为政清明；在自身修养上，坚持廉洁自律，不食不受；在做官效果上，坚持以人民满意为准则，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

中国方正出版社

怎样做好官

邵景均 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怎样做好官/邵景均著.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 - 7 - 80216 - 798 - 8

I. ①怎… II. ①邵… III. ①干部—道德修养—研究—中国
IV. ①D630.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4346 号

怎样做好官

邵景均 著

责任编辑: 刘彦彩

责任印制: 李 华

出版发行: 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100053)

发行部:(010)59594611 门市部:(010)66560513

编辑部:(010)59594625 出版部:(010)66562755

邮购部:(010)66560933

网址:www. lianzheng. com. cn

责编 E-mail:fangzheng1313@126.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80216 - 798 - 8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前 言

本书的主要观点和逻辑关系

怎样做好官，而不当贪官、懒官、庸官、奢官、坏官，这是古往今来许多为官者终身思考的大事情，也是历朝历代百姓们十分关注的大问题。本书认为，能不能做好官，受社会整体进步状况、官场环境和个人的德、才、学、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其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是官员自身的官德。一般地说，官德好，这个官就容易当好，成为百姓拥戴的好官。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哪里有民，哪里便有官；哪里有官，哪里就有一个官德问题。官德始终居于官的核心和统帅地位，居于社会道德的核心和统帅地位。古代智者指出，好的官德是真正的“国宝”。官德如何，直接影响社会风气，影响国家的治乱兴衰。在今天，搞好干部队伍道德建设，对促进发展、改革、稳定特别是廉洁政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古到今，有关怎样做官以及官德的论述多如牛毛。本书力求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重点论述做好官的五个最重要的问题，或者叫官德五要素，并作如下逻辑划分：

在做官起点和灵魂上，讲“公”；

在与人民群众关系上，讲“仁”；

在对待工作的态度上，讲“明”；

在自身修养和行为上，讲“廉”；

在做官归宿和效果上，讲“功”。

当然，这种划分未必准确、严密。一个人怎样做官，完全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选择，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官德是个有机的

目 录

前言	(1)
引论：官德源流	(1)
一、官与官德的起源	(2)
二、原始社会的官德	(7)
三、私有制社会官德	(12)
四、新中国干部道德	(26)
五、官德的本质	(33)
第一章 公：大公无私	(37)
一、官德的出发点和灵魂	(37)
二、当代干部道德的核心	(44)
三、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	(49)
四、忠于职守的从政美德	(55)
五、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59)
第二章 仁：仁者爱民	(64)
一、官民一体 人间大爱	(65)
二、真诚待人 与人为善	(74)
三、心中有民 扶贫济困	(80)
四、言行一致 取信于民	(86)
五、深入基层 联系群众	(90)
第三章 明：明道善策	(95)
一、明大势 善行大道	(95)
二、明决策 善做善成	(109)

引论：官德源流

官，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文字符号，它所代表的是人人都熟悉的特殊职业和无法小视的某种权力。《辞海》对“官”的解释，主要是“旧时担任国家或政府职务的人员”，“现在军队和外交界也还沿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兴起后，或许认为“官”的封建统治味道太浓，于是引进了一个新词——干部。依《辞海》所说，“干部”一词“源出法语 *cadre* 的日语意译。在我国，通常指担任公职的人员……有时专指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的人”。其实，在汉语言中，“官”依“管”而来，是担负社会管理职能的人，本质上和“干部”都属于中性词汇，是指在政府和公共组织中担负一定职务的人员，无需刻意回避^①。基于这种概念的确定，本书若不作特别的说明，将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汇。

德，是道德的简称。在古文字中，“德”是写作“惇”的。上面是“直”，下面是“心”，意思是讲，所言所行都要把心思放端正。引申出来，就是要怀善心，行善事。

官德，简单地说，就是做官的职业道德，或者说，遵循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去做官；进一步的含义，要求怀着善心去做官，做官要多行善事。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官”的社会性质不同，“德”的含义不同，“善”的标准也不完全一样。因此，探讨官德，就应该从它的源头说起。

^① 对于“官”与“官德”的称谓，并不表明政治上的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常常用这一称谓说明问题。习近平于《求是》2004年第19期就发表了题为《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的文章。

一、官与官德的起源

人类之初，出于生存的需要而群居。人民集体劳动，共同消费，共同防御自然灾害、猛兽以及外部落人群的袭击。为了在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中能够有效地达到大家较为一致的愿望，取得大家预想的效果，于是自然而然地需要有人出来指挥和协调。这样，悄然地产生了最初的领导者，即后来的所谓“官”。

（一）“官”与“民”的分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人类初期，“官”的产生并不是人们有意识的自觉行动，而是在不经意的、偶然的行动中产生的。可能，人们在某一次的狩猎中，有人提出了一个好办法，逮住了一头凶猛的野兽；也可能，在某一次与外部落的斗争中，有人奋不顾身，一马当先，率领大家取得了胜利；还可能，在某一次饥寒交迫的旅途中，有人引导大家找到了食物和躲避风雪的安身之所，摆脱了险境，等等。这个人实际上就成了最初的领导者。如果这样的“可能”和“某一次”多了，这个人经常充当这种领导的角色，就会逐渐地为人们所信赖。每当群体遇到重大事情需要决策的时候，人们便会习惯地求助于他，听从他的意见。久而久之，他在群众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成了有号召力的核心人物。后来，人们“组织起来”的自觉性增强了，认为应该把这种特殊人物的作用相对固定化，便通过部落一定的选举程序，推举他成了部落的首领，由他领导和管理部落公共事务。这个人就是后来人称谓的“官”。那些对人类贡献更大的，得到更多人群拥护的，则成为更多部族的大首领，即“大官”，后人称之为“王”、“皇”、“帝”等。

“官”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组织化的开端，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一次重大飞跃，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巨大进步。传统的社会发展史和伦理学教科书在讲述人类最初的社会分工时，都坚持“二次分工论”——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两次大分工出现了三类社

会行业和劳动职业，即农业和农人，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畜牧业和牧人，同时也相应地出现了三种最原始的职业道德。本书认为这种“二次分工论”不足以正确说明人类文明最初的进化历史，正确的结论应该是“三次分工论”——在这两次社会大分工之前，还有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官与民的分工。这是真正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官与民的分工不仅在时间上是最早的社会分工，而且对这以后的分工作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只有官与民的分工完成了，才能在官的指挥与协调之下，一些人去从事畜牧业，一些人去从事农业，一些人去从事手工业，大家分工明确，互相配合，保持合理的生产生活秩序。所以，没有这个“第一次”，就没有以后的“第二次”、“第三次”。

（二）“官”是创造特殊价值的劳动者

讲“官”与“官德”，必须首先承认官的价值，承认官的管理活动是一种社会劳动，也创造着某种特殊的价值。在这个前提性问题上，需要正本清源。

长期以来，受苏联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生产劳动观点认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而把从事第三产业的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劳动称为非生产劳动，认为它不创造价值，也不计算产值，仅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处理。其中，对承担社会管理和领导职能的“官”，连“社会劳动”都不承认，常常用“工人、农民养活干部”的观点教育干部。这对于培养干部的公仆意识或许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对的，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在人类社会之初，为什么要在“一律平等”的人群中非得推选出一人或一些人当“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一些，这里，再作进一步的阐述。假定最初人类社会由100人组成。开始，人类以狩猎、打鱼为生，100个人一起出动，干“一样的活”。这时刚刚实现第一次社会分工而产生出来的“官”，是不脱离具体生产劳动的，只是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带领大家把事情干好，其价值一时还看得不够清楚或者说无法计算。后来，

随着人们生产、生活实践范围的扩大，逐渐开辟了农业和手工业等新的工作领域，新的问题也就出现了：这 100 个人中，到底该哪些人打猎，哪些人种地，哪些人纺纱织布，哪些人做衣服，每一项工作需要多少人，各项工作之间如何连接？凡此种种的问题，只靠原来那位不脱离某项生产劳动的“兼职领导”，已经无法胜任了。由于没有专人“管”，生产秩序混乱，有的人没有活儿干，有的活儿没有人干，每年总产值仅 100 元（当然还是“假定”）；生产秩序的混乱又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原本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出现了怨恨和动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00 个人经过讨论，决定原来那位“兼职领导”脱离具体生产劳动，专门当“官”，进行生产和社会的管理工作，集中大家正确的意见，处理社会矛盾，对大家的劳动进行指挥和协调。由于有了这位“官”的指挥和协调，社会劳动开始协调有序，其他 99 个人的生产劳动能够按部就班，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彼此合作，效益大增，每年总产值达到了 300 元。

为什么社会总产值能从 100 元增加到 300 元呢？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只认定从事第一、二产业的那 99 人是劳动者，创造价值，而领导者不是劳动者，不创造价值，那么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所增加的那 200 元产值，完全是因为有了官的正确管理，这正是官的管理劳动价值所在。虽然这 200 元不是直接出自官之手，但它是由官和被管理者共同创造的，理应有官的一份。官付出的是他的学识和才智，主要是脑力劳动。

社会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但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劳动才表现为价值。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抽象劳动。既然官的管理活动是一种社会劳动，那么必然具有劳动价值追求，也必然有其特定的价值表现形态。

我们知道，工人的劳动价值，一般体现在他所生产的产品上。在传统手工业时代，一个工人自己打一把镰刀，如果镰刀的价值是 1 元，那么工人的劳动价值就是 1 元，可以不打折扣。在现代工厂里，工人用先进的大机器生产镰刀。如果这时镰刀的价值仍然是 1 元，那么分到工人名下的劳动价值就不可能再是 1 元了。因为使用大机器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

提高了，镰刀的价值里面除了有工人的劳动含量，还有科技含量、教育含量和管理含量等，分到工人名下的劳动价值可能只有2角或3角。这说明，劳动价值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尽管如此，工人的劳动价值总归是体现在他的劳动产品上，比较单一，而官的管理活动价值表现，就复杂得多了。

当然，官的劳动价值并不总是“正价值”。在漫长的历史上，许多时候社会发生的那些人为的灾难，大都是官造成的。东汉末年那种惨痛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景象，就是直接来于官的腐败、无能和胡作非为。这时官的劳动价值总体上是“负价值”。随着人类文明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官的管理价值，因为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倒退、人民的安乐与忧患、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国家的统一与分裂。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完全是人类共同劳动的需要，是社会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官的管理活动是一种社会劳动，同样创造着劳动价值；官与社会其他劳动者之间，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劳动分工、相互交换劳动成果的关系，不是“谁养活谁”的关系；如同普通劳动者会生产废品一样，官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异，存在着给更多人带来伤害的可能性。正是出于对这最后一点的认识，日益文明的人类才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限制官的权力和行为，也才有了日益完善的官德规范。

（三）官德的最初形成

包括官德在内的人类道德，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社会劳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对人的道德的需要。最初，劳动是涵盖人类一切领域的原始活动，没有分工，因而不可能产生道德。后来，劳动的深化，出现了分工与协作，逐渐形成了官、农人、牧人、手工业者等职业。这就把人的活动和人与人的关系相对固定在一定的劳动领域。不同职业的人多次重复各自劳动领域的活动，就会产生某种习惯和秩序，使劳动活动得以维持。随着劳动活动日趋复杂，对分工和协作的要求逐渐增多，仅靠

劳动本身那种自然性来维持就不够了，需要有一种新的东西来维持劳动的秩序。于是，人们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确立了一系列风俗习惯和道德。对这一过程，恩格斯有一个科学的概括：“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①。这里说的法律是指习惯法。其实，这个过程也是道德法即道德规范产生的过程。官德是职业道德的一种。最早的官德，也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从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社会劳动是道德起源的基础。在社会劳动这个基础上，产生道德、官德的基本条件主要是四个：第一，社会关系的形成是道德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人的社会关系首先是一种劳动关系，是劳动活动推动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性劳动把本来孤立的个体联系起来，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关系。这就是最初的社会关系。孤立的个人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第二，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道德产生的主观条件。当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利益，而且也意识到他人的、整体的存在和利益，道德才会产生。第三，劳动是道德产生所需要的主客观统一的社会条件。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建立起了比较经常而固定的各种社会关系，并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包括道德意识在内的各种意识。第四，社会分工是道德从萌芽到生成的关键条件。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相互交往复杂了。产生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和与之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从而产生了从道德意识上约束人的行为，调整各种利益矛盾，维系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日久天长便形成了一些最简单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就是最初的道德准则。

原始社会的官德，主要是以行为、动作、方式、语言等形式表现出来；以氏族禁忌、宗教仪式、外在的简单手段、攀仿前辈部落首领的行为等形式表现出来。通过这些形式，部落首领约束自己“应该做什么、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539页。

应该做什么”，“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部落群众也依此要求和评价自己的首领。在原始社会里，官德与其他职业道德一样，还没有形成严格的道德观念，尚处于萌芽阶段。尽管如此，这已经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性巨大进步了。

二、原始社会的官德

任何事物在其生成时期都是不健全、不完善的，但是，生成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基本属性，如“基因”一般，却能够伴随它的“一生”，为它的发展和完善奠定基础。官德也是这样。尽管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官德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其中一些基本的东西却是“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搞清楚原始社会官德的基本内容，不论对于认识私有制社会官德的异化及其阶级本质，还是认识和建设当代干部道德，都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原始社会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我们对那时官德的研究，只能根据后来文献记载的传说，其中主要是关于原始社会末期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即“五帝”的传说。

在原始社会，特别是在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在推选部落首领时，对“德”的要求特别严格。黄帝一生勤政、爱民，辛勤操劳，生活俭朴。他劈山开道，四处巡视，使华夏文明远播。他专门设置了对官员实施监督的左右大监，对各氏族、部落行使监察权。《帝王世纪》载：“帝颛顼……有圣德。父昌意虽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为诸侯。”又载：“帝喾……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又载：“尧娶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这几段话是说，颛顼、帝喾、舜、



禹（前 2081—前 1978 年）姓姁，名文命，字高密。夏后氏首领、夏朝第一任君王，于公元前 2029 年至公元前 1978 年在位。最卓著的功绩，是治理黄河水患有功，又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

禹都是德行突出的人，所以才当上了部落联盟领袖；尽管昌宜是黄帝的亲儿子、颛顼的父亲，丹朱是尧的儿子，商均是舜的儿子，但是由于他们的德行不佳，不能当领袖。

原始社会对官德的基本要求是多方面的。

1. 公正无私

原始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维护这一基础的部落的共同利益，是人们的共同要求。反映在道德观念上，讲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①。所以那些德高望重的领袖才能做到“任人唯贤”，而不“任人唯亲”。领导者不但要自己公正无私，而且也要这样带领和教育下属。《淮南子》上说：黄帝使“百官正而无私，辅弼公而不阿。”那时公正、不私、不阿的人才能当官。

2. 仁慈爱民

黄帝 号轩辕氏，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以统一华夏部落与征服东夷、九黎族而统一中华的伟绩载入史册。黄帝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并有了文字。《淮南子》记载，黄帝做领袖的时候，“百官正而无私，辅弼公而不阿。”“使强不得掩弱，众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

维护氏族内的自由、平等是原始社会重要的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首领对民众必须有慈爱之心。《淮南子》记载说，黄帝做领袖的时候，“使强不得掩弱，众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他以德义教化民众，反对强者欺凌弱者、人多的损害人少的，所以人寿年丰。《尸子》记载说，舜“家本冀州”，多次迁徙。由于他对百姓仁爱，百姓们都愿意跟着他走，“每徙则百姓归之”，人越聚越多，于是出现了“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的动人景象。领导者不

^① 《礼记·礼运篇》。

仅对追随他的人讲仁爱，对曾经反对他甚至阴谋陷害他的人，也宽大为怀。舜的继母、继母生的弟弟以及父亲，曾串通一气，几次想陷害他。他逃过之后，对他们依然如故，不失子道，不失兄德。

3. 勤劳俭朴

共同劳动、吃苦耐劳、同甘共苦是氏族成员推崇的美德，不能因为当了官就脱离了劳动，在生活上搞特殊化。舜被尧选定为接班人之后，仍然亲自耕种、捕鱼、制陶，至今还有“舜耕于历山”的传说。“大禹治水”更是尽人皆知。他们生活俭朴，与百姓没有什么差别。《淮南子》、《韩非子》都曾经记载，尧住的是不加雕饰的茅草屋，吃的是糙米饭和没有调料的野菜根，用土缶当餐具，穿的粗布衣刚刚能遮住身体，冬天披鹿皮御寒，衣服鞋子不穿烂了不换新的。为此，《淮南子》还大为感慨了一番：人们之所以都愿意当官，为的就是满足各种欲望，锦衣美食，舒适享乐，尧怎么就不是这样呢！这固然是因为原始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低下，但也主要是由当时勤劳俭朴的道德观念决定的。



舜 名重华。中华五帝之一。受尧的“禅让”而称帝于天下，其国号为“有虞”，故号为“有虞氏帝舜”。《尸子》记载，舜“家本冀州”，多次迁徙。由于他对百姓仁爱，百姓们都愿意跟着他走，“每徙则百姓归之”，人越聚越多，出现了“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的动人景象。

4. 明于事理

官应当有比常人更多的知识、智慧和更大的影响力、号召力。“五帝”都是为政清明的贤君。他们决策英明，有效地治理了社会；用人开明，“选贤与能”，重用了许多贤能人士，像舜所任命的契为司徒、皋陶为士、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都做出了突出成就。帝尧提出，“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①。他们注重广开言路，及时

^① 引自贾谊《新书·修证语上》。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帝王世纪》记载说：尧“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阳，置敢谏之鼓。”专门设置一种鼓，人们可以击鼓进谏。舜执政后，为了鼓励人们提意见，“立诽谤之木”，鼓励人们把批评意见写在木牌上面。诽谤，在古代是褒义词，是善意批评的意思。

5. 严于律己



尧 中华五帝之一。孔子用“富而不骄，贵而不豫”评价尧的为人。尧之为政“战战栗栗，日慎一日”。《淮南子》记载，尧住的是不加雕饰的茅草屋，吃的是糙米饭和没有调料的野菜根，用土缶当餐具，穿的粗布衣刚刚能遮住身体，冬天披鹿皮御寒，衣服鞋子不穿烂了不换新的。

氏族首领有相当大的权力和权威，但是他们并不滥用权力。正如恩格斯所说：“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①。尧是帝喾的儿子，虽出身显贵，却不骄傲、放纵，一直谨慎小心，说自己为政“战战栗栗，日慎一日”^②。孔子曾经用“富而不骄，贵而不豫”评价尧的为人。豫，意为贪图快乐。他位高权重之后，不骄傲，不贪图安逸。在与他人交往中，要求自己尊重他人，做到“隐恶扬善”，隐讳其缺点，宣扬其好处。

6. 注重政绩

“五帝”都是有巨大贡献于华夏民族的。“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河图·挺佐辅》）舜与他人交往“讲信修睦”、“隐恶扬善”，但对社会公认的坏人却不手软，而是严惩不贷。他把浑敦、穷奇、饕餮、檮杌四凶流放，维护社会稳定，这件事一直为世人称道。

在为官的理论上，传说上古时期与尧、舜、禹一起并称为“上古四圣”的政治家皋陶，曾有过一系列真知灼见。皋陶认为，上天造就了万物并赋予了其美好的德性，因此一切遵从天意，保持美好的德性是人的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② 《淮南子·人间训》。

圣职责。官员的为政之道是辅弼君主按天理行事。皋陶掌管司法，他首要的政治主张是提倡“仁政”、“德治”，提出“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圣人九德”等。皋陶提出的“九德”是：“宽而栗（宽宏大量而又严肃恭谨），柔而立（性情温和而又有主见），愿而恭（态度谦虚而又庄重严肃），乱而敬（具有才干而又办事认真），扰而毅（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而又刚毅果断），直而温（行为正直而又态度温和），简而廉（直率旷达而又注重小节），刚而塞（刚正不阿而又脚踏实地），强而义（坚强勇敢而又合符道义）。”他认为，能在行为中表现出这九种品德，就会时时处处吉祥顺利。每天都能在行为中表现出九德中的三德，早晚恭敬努力地去实行，就可以做卿大夫。每天都能庄重恭敬地实行九德中的六德，就可以协助天子处理政务而成为诸侯。天子修德不懈，方可成为圣贤，施恩于人民。如果能把九种品德集中起来全面的实行，众多的功业就可以建成了。



皋陶 偃姓，又作咎陶、咎繇。是舜帝和夏朝初期的一位贤臣，与尧、舜、禹一起并称为“上古四圣”。曾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闻名天下，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他提出的“圣人九德”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建立在原始共产主义基础上的官德，的确是令后人称道的。恩格斯曾经感叹地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美妙的制度啊！”^①我国的孔子等一大批学者对原始社会领导者道德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后人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先圣先贤们相比。这种“厚古薄今”的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处于私有制度下面的官吏，即“今人”，其官德在许多方面确实无法与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那些首领相比。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所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决定和制约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可以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私有制度下官德的两重性、虚伪性进一步说明。当然，原始社会的官德与其制度一样，受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避免地具有朴素性、狭隘性、简单性特点。由于语言贫乏，意识不发达，思维方式简单，还不能用准确的概念概括自己的道德准则、规范及原则，道德评价处于萌芽状态。另外，人们的道德眼界，很难越过部落的界限。一切道德要求仅存在于氏族和部落内部这个狭隘的范围内。所有这些不足，都不能苛求于当时的人们，必须通过社会进步来解决。

三、私有制社会官德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产生，“美妙的”原始社会由“残酷的”奴隶社会所代替。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在原始社会，人们的道德意识比较混沌、朦胧。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已经有能力分工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语言发达了，有了文字，人的自我意识增强，终于形成道德的概念和一系列理论、规范，也使官德从萌芽状态逐渐发展成为成熟形态。

（一）官德理论的初步形成

进入奴隶社会初期，整个社会文化同原始社会末期差不多，仍然继承着宗教迷信的传统，人们的迷信心理相当浓厚。他们敬事鬼神，迷信占卜，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大事小事，几乎是无事不卜，无日不卜。他们认为作为至上神、全能神，同时也是祖先神的“上帝”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人世间的风雨晦明、吉凶祸福、战争的胜败、官吏的任免都由这位上帝所主宰。但是，自从人间出现了阶级差别之后，人神关系上也出现了“绝地天通”（《尚书·吕刑》），即普通的人断绝了与天的沟通渠道，人间的帝王和巫祝才是可以与上帝沟通的人，他们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代言人。人间帝王的统治权威来源于上帝，他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这反映到社会治理方面，不论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还是下层官员，都把“天”、“上帝”的意志捧得很高，鼓吹“天命”、“君权神授”。官们的行为如何，都是“天”、“上帝”的安排，百姓是不能反对的。在这样